

吴雷川：一诚足以消万伪

◎ 两浙人物 □ 周维强

“一诚足以消万伪”，这是明初曹月川说的话。吴雷川先生(1870~1944)甚为赞许，所以记录在1930年7月1日的日记里。吴雷川是浙江杭县(今杭州)人，清末翰林，著名教育家。他立身处世最看重一个“诚”字，所以这年5月19日的日记里，对“诚”有比较多的讨论：“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……反之，则言行不相顾，假公济私，利己损人，是皆不诚之最著者。”雷川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还检讨“中国社会之不宁”的“病根”，主要在于上述“不诚之最著者”。尝读《吴雷川日记》，在日记里也能看出雷川先生事无巨细，身体力行一个“诚”字。

先举雷川先生私人财务处理上的几个例子。

吴雷川当时任职燕京大学校长，并在神学院和中文系授课。1932年，雷川先生63岁，有“精力日衰”之感，所以这年6月10日写给教务长司徒雷登的信里说：“鄙人近因精力日衰，乐于习静，故愿下学期内除每周一次到校授课并处理重要文件外，余日均住西山，藉资休息。”减去了工作量，雷川先生在信里接着就表达给自己降薪的意见：“惟是工作既逐渐减少，薪金亦不应多受。拟自七月份起，每月薪金照原数收三分之二，即二百四十元。所余之一百二十元，可由校中另行支配用途。即希先生代为报告于执行委员会，并通知会计处是掌。”1937年4月，司徒雷登先生询问雷川先生下学期可否仍在燕京任课，雷川先生表示因身体不健，希望不再任课，4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天给司徒雷登的回复意见：“学校提存会计课之每月百元，决不领受，仍捐与学校作奖学金基金，故下学期大可不再提存。”

王钟翰是燕京大学的学生，毕业留校做助教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关闭，王钟翰被介绍到天津的东亚毛织公司工作。王钟翰后来在自述里说：“东亚毛织公司的总经理宋斐卿，山东人，也是燕京的校友，不过比我早多了……宋先生是个有文化气魄的生意人，当时，他打算编一套《人人丛书》，供那些初识字的人们读。我到了那里之后，宋斐卿先是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。我搜集了有关‘墨’的资料，用了个礼拜的时间，写了一篇关于‘墨’的文章，一万字。宋斐卿看了之后，很满意。他让员工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，散发给工人们当作课外读物。就这样，我在东亚毛织公司开始工作。之前我在燕大毕业留校之后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六块，在东亚毛织公司，我的工资是一百八。当时我一个人，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饭，也花不了那么多钱，就把钱寄到还在北京的燕京老师邓之诚和洪业先生家里，补贴他们的生活。”王钟翰接济老师的事情后来被宋斐卿知道了，宋斐卿跟王钟翰说：“你工资这点钱能养几个人？不过你的心意很好。你开一个名单给我，写清楚每个人需要多少。”王钟翰就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宋斐卿先生，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单，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为生活费用。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。王钟翰只要有可能，总会想到给燕京大学的老师以帮助。吴雷川1942年11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下午王钟翰来，言天津东亚毛织公司捐与安安公司数千元，安安公司应填给股票，而东亚毛织公司又不欲得受。故有人提议将此股票分赠于所愿赠与之入，遂赠予十六股，每股五十元，计为八百元，特交来股金收据一纸，他日可换股票。”这笔股金如何处置，吴雷川日记里说



1928年，燕大学院执行委员会合影，前排中为吴雷川

“仓猝间未暇细思，姑告王以须于吴雷川之下加公记二字，表明非余之私产，将来此股票所得利息应仍为公益事业之用也。王即于收据上记名处加公记二字，并允代告该公司于存根上亦加入。”雷川先生不拂学生的好意而收取股票，但仍作公益之用。几天后，雷川先生将股金收据交给燕京大学秘书长萧正谊。12月4日的日记里，雷川先生记道：“九时三刻出园，乘车至萧正谊处，晤其伉俪。当将王钟翰交来之安安公司股金收据一纸托其代为收存，并说明将来此股票所得之利益，仍为公益之用，因恐存余处，后人或误认为个人之私产，故托其代存也。”雷川先生考虑真是周到。当时收到安安公司股金的应该不止雷川先生一人，12月9日的日记里再记此事：“陆志韦来，谈安安公司赠股金收据事。余以余之处分情形告之……”陆志韦是语言学家、心理学家，这个时候已从日本监狱里出来，不再代理燕京大学校长职务，但仍然参与了校政校务。

雷川先生个人财务处置上公私界限明确，对待社会组织慕名而来的聘请，也是实事求是，不作邀名逐利的事。1933年大约9月间，杭州之江学院转达中山文化教育馆给雷川先生的书函及聘书，雷川先生想立即去函表示谢绝，“又恐有负盛意”。10月份中山文化教育馆再次请之江学院转达邀请的信函，雷川先生书面作了委婉的谢却，信里写道：“自维不通西文，难膺审订之任……既不克履行任务，自不应徒拥虚名。谨据实陈明，随函将聘书一件奉缴，敬希簪入，并恳原谅是荷。”雷川先生的这封回信记录在这一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。

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封校后，教师失去教职，也断了固定的收入，雷川先生也不能例外。周作人托人邀请雷川先生到“北大文院”任教授，“不必授课，而从事指导工作”。这自然也可以视作周作人想给予雷川先生帮助，雷川先生婉却了周作人的邀请，他在1942年6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时给周作人的答复：“现时生活尚可自给，故对此不需要，如将来至不能写字谋生事，当领盛情也。”并托这位转达者“对周代表感谢之意”。话说得很客气，但雷川先生直到1944年去世，都未曾到过“伪北大”任职。

上面所述的这几个例子，可以见出雷川先生立身处世的“诚”。

雷川先生持节自守，却也是一个极有风趣极雅致的人。刘廷芳协助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，司徒雷登后来说刘廷芳“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，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”。刘廷芳留美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学位，也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始人。1930年2月，刘廷芳结婚十五年志庆，雷川先生致信刘廷芳，这封信也记录在雷川先生这一年2月22日的日记里，信里写道：“家藏蜜酒一瓶，椰杯二具，敬以奉赠，区区微物不足珍，惟以使留之十年，乃至三十五年时，开瓶对酌，念及鄙人，是亦一段佳话耳。”美意可感而生动风趣。

雷川先生1930年5月19日的日记里，保留了他给学生作的一段演讲词：“鄙人自惭老朽，又素无学识，可以贡献于诸君，惟本诸一身之经验，谨述《中庸》之言以勸诸君，曰‘不诚无物’，曰‘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’。幸诸君留意焉。”“中国社会之不宁”的“病根”究竟在哪儿？容或有不同于吴雷川先生的认识。吴雷川先生的可敬之处，在于自己能够知行合一，立身以诚。自己提出要“诚”，自己先做到，而不是只打着手电筒照别人。

吴雷川先生的履历，先生自己有过文字记录，日记里均有保存，一处是1930年5月9日的日记里留存的写给申报馆的履历：“吴雷川，原名震春，以字行，浙江杭县人。公立一千八百七十年生，前清光绪癸巳科，顺天乡试中式举人。戊戌科进士，翰林院编修。历任江西高等学堂监督、浙江高等学堂监督……十四年(即民国十四年，纪元1925年)三月，升任教育部参事。十五年五月辞职，任北京私立燕京大学教授兼副校长。十七年一月，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。十八年四月辞职，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校长。”另一处是保存在1933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的“题陈迈齋《湖山归养图》”里的自叙身世：“余著籍杭县，而生于江苏之徐州，稍长更随于淮扬间。维属廿六秋偶返杭应试……”雷川先生流传下来的著作有《墨翟与耶稣》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》等，书名即可见出雷川先生主要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研究。前一种书，前些年收入任继愈主编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《墨子大全》第二编，后一种书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些年重印过单行本。

掠一空。

张昌庆压制爱国学生运动的事件一出，立即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：嘉兴学生联合会在《申报》上发表《泣告国人书》，呼吁各地声援；嘉兴及海宁、嘉善、海盐、崇德等县教育会致电浙江督军、省长等，要求伸张正义；在上海的嘉郡会馆董事会全体董事也致电省长齐耀珊，请求主持公道，以平众怒。《申报》更在1919年7月至9月期间连篇累牍地登载了揭露张昌庆罪行的有关报道。鸳鸯蝴蝶派作家、民国武侠小说健将吴虞公在他的《民国奇闻·知事罪恶史》中，历数张昌庆“征存国税、欺压商民、匿灾不报、吞没节赏、勒索规费、枪杀平民、私刑拷讯、诬陷灾民、作伪害民、纵容庄书光复以来科造册单”等“十大罪状”，并说“其余罪恶，实不胜枚举”。

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，张昌庆自知舆论不容，遂于8月23日“呈请辞职”，省长齐耀珊不得不将其调任。由民国七年(1918)开始兴建的烟雨楼，到张昌庆罢官时尚未竣工。据《申报》1919年9月10日报道，嘉兴士绅建议：“除将该知事种种劣迹控准省吏撤回任查办外，并议建立遗臭万年碑，一立南湖烟雨楼，一立公共运动场，以为贪墨者戒。”

◎ 史林偶拾

举人比进士好

□ 李健

左宗棠曾巡视温州，大小官员递上名刺等候召见。按惯例是按官职大小顺序接见，而左巡抚拿起排在最前面的温、处、台道员名刺，看到上面写着“道光乙巳科进士、前翰林院侍读”，眉头一皱信手丢于一边。再拿起温州知府的名刺，上面写着“咸丰甲午科进士”字样，又丢下。再拿起平阳县令的名刺，还是进士，掷于案。从最底下抽出一张，终于露出了笑容，永嘉县丞黄惟清的名刺上清楚写着举人出身。

第一个召见的是县丞，令在场的大小官员惊愕。问过简历后，左宗棠问道：“依你看，官员中进士好，还是举人出身好？”黄惟清回答：“我认为举人比进士好。”左宗棠眼睛一亮，追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黄惟清一吐为快：“大凡人在秀才时，整个心

思都在经营试帖八股上，此外无暇顾及。待到中进士，则即刻授官，成天忙于应酬簿书之中，亦无心钻研学问。最好是乡榜告捷，胸襟始展，志气犹宏，经世文章、政治沿革都有充分时间潜心研究，到时出仕膺任显要，可从容施展胸中抱负，极少尸位素餐之徒。”左宗棠听了拍案叫绝，连声赞道：“好！这真是一篇好议论，我今天有幸听到，足下真不愧为举子中的佼佼者。”他破例亲送黄惟清到门口，对随员大发感慨道：“此间好官，仅一黄县丞。可惜这样有见识之人竟屈抑下僚。”此话传开，浙江大小官员无不哑然失笑。

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一个心结，他的言行也有失偏颇，但黄惟清的观点却不无道理。高学历只能证明你所受的教育比别人多，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比较深厚，但并不等同于你的知识结构、综合能力就高人一等，关键还要看你的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。

吴冠中的超强自信

□ 姚素川

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，是当代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。1942年，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吴冠中便产生了出国深造的打算，不过，由于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，吴冠中便打算等过一段时间再说，没想到，这一等便是4年时间。

1946年，吴冠中和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周明镇同住一个房间，两人都在为报考公派留学做考前准备。周明镇当时瞅准了美国的招生目录，而吴冠中心里则只有一个目标——公派留法的西洋美术专业。因为公派名额非常少，希冀留洋的学生无不为这个机遇而努力着。

一天，当周明镇看到公派留法美术专业的名额时，不禁为室友捏了一把汗。他提醒躺在光板床上看书的吴冠中：“公派留法的名额只有两个，竞争非常激烈，你可千万要小心了！”谁知，吴冠中在听了周明镇善意的提醒后，竟然头也不抬，只是

自顾自地看着书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缓缓地举起一只胳膊，然后再伸出一根食指，信心十足地对室友说：“两个都多，只消一个！”听了吴冠中的话后，周明镇不免对他的过于“爆棚”的自信心有些担忧，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：“你就这么自信，难道就不担心考不上吗？”谁知，吴冠中并没有回答周明镇的提问，只是笑而不语。

没过多久，公派留洋的考试成绩下来，吴冠中考取了全国公费留学绘画第一名的好成绩，整个过程压根就没有出现一点意外和波折，这令周明镇非常佩服，连连赞其“与常人不一样”。

多年后，提起那次留洋考取第一名的事情，吴冠中依旧显得很平淡。他表示，当初自己充满自信但并没有自傲，因为他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。吴冠中说：“说实话，任何成功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，想成功，靠的就是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。”

蔡元培卖豆腐

□ 刘中才

1907年，40岁的蔡元培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到清政府追捕，被逼无奈，他只好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，之后又流亡法国，一边学习深造，一边继续革命。

革命不仅意味着流血牺牲，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资金经费作保障。当时流亡法国的同盟会员都没有钱，生活十分落魄，从事革命工作极为困难。蔡元培等人为筹措活动经费，就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店。从事革命活动之余，蔡元培还要兼顾做豆腐和卖豆腐的生意。

由于豆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吃起来软嫩香

滑，蔡元培的豆腐店一经开业就大受欢迎，每日前来店中购买豆腐的巴黎市民络绎不绝，常常是豆腐出炉立即售罄。

为了扩大经营规模，蔡元培在制作豆腐的基础上另辟蹊径，先后推出豆腐脑、豆腐皮、豆浆等多个豆制品门类。这些豆制品味道鲜美，入口生津，不仅满足了巴黎市民的口味，也让他们大饱眼福，豆腐店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赚的钱越来越多。

不过蔡元培的心思并不在商场，赚来的钱悉数用在了留法同盟会会员的日常生活开支和革命事业上。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，陈其美致电催促蔡元培回国，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国内，巴黎的豆腐店也随之关张。

梅兰芳婉拒做总统

□ 张达明

梅兰芳10岁时因主演《天仙配》而一举成名，此后，他更是刻苦钻研，很快就蜚声大江南北，引来“粉丝”无数。“粉丝”中不仅有平民百姓，就连许多国会议员也对他由崇拜继而痴迷。

1912年2月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，国会议员在酝酿选举继任大总统人选时，许多“粉丝”议员决定提名由梅兰芳出任总统。当这些议员对他说明来意后，不禁让年仅18岁的梅兰芳目瞪口呆。好一阵，他才回过神来，真诚地对大家说：“十分感谢诸位对我的信任。但起码有3个理由决定了我不可能参选总统。其一，我的年龄还不

到20岁，是不具备总统参选资格的。其二，即使我达到参选年龄，也是不会去参选的。我这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唱好戏，只要能让大家得到快乐，同样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吗？其三，万一我当选了总统，我还有时间去唱歌吗？你们想看我演戏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吗？所以，不论从哪方面讲，我都不适合去参选那个大总统，我的人生就在舞台上。”

这些“粉丝”议员的行为虽然有些唐突，但却更激励了梅兰芳，也使他决心以更精湛的演技，不辜负“粉丝”们对自己的信赖和热爱。

对于梅兰芳婉拒参选总统的诚意，媒体以明代诗人洪应明的诗予以赞扬：宠辱莫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

◎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，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，都有一段历史



水乡农民掘河泥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蜀河泥是浙北水乡农民在冬季开展河道清淤疏浚、积肥、净化河道水质的传统农业水利活动。蜀河泥不仅为农田作物提供了充足的肥料，而且自古以来还是疏通河道的好方法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后，由于化肥的大量供应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，蜀河泥这一农事活动已经几乎绝迹了。图为上世纪70年代海盐县官堂公社农民将河泥从船上挑至田间。

照片提供者：朱积良

◎ 文化史谭 □ 梅晓民

文化老人吴藕汀在他的《药窗诗话》中有一则《汪知事》，起首就写道：“在我还只有七岁的民国八年(即1919年)，嘉兴出现了这时还没有‘标语’这一名称的标语，写着‘驱逐民贼张昌庆’，为的是商业学界，要赶走一个不与地方上和洽的县知事。”

说起嘉兴知事张昌庆，大多数读者称道的是他重修南湖烟雨楼的功绩。殊不知，他是一个依托北洋军阀假虎威、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酷吏。

1919年7月，“五四”学潮早已波及禾城，爱国学生喊出了“抵制日货、提倡国货”的口号，积极筹备设立国货陈列所，并决定在隶属于嘉兴教育会的公共演讲厅演出爱国剧筹款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学生们事先将此事通告嘉兴知事张昌庆及北洋军阀驻嘉司令、团长夏兆麟，学生代表向二人解释，因建立国货陈列所缺乏经费，不得不以演剧形式筹款，且演爱国剧既不妨碍治安，还可补助社会教育经费。但张、夏二人互相推诿，说了许多如“国货陈列所需款，吾辈当慷慨解囊，无需演剧”“惟此款项须陈列所办有成效时方能捐入”等话作托词。学生代

表以入场券已经售出大半，而所收入的款项已购办国货支用完，知事和团长如能立即捐款将入场券赎回，我们可以停演等。但张昌庆仍以拖延之词相敷衍。

时值嘉兴、海宁、海盐、嘉善、崇德各县教育会代表在湖州省立第三中学召开教育研究讲演会，邀请郑宗海、陶行知等先生演讲。会议间隙，大家谈及嘉兴演剧筹款之事，都说不妨开演。于是学生决定于7月18日下午在公共演讲厅排演。

岂料那天大幕刚刚拉开，一警佐即带领8名警察到现场勒令停售门票，售票人员以“演剧已经教育会许可，警察无权干涉，如有疑问可与教育会接洽”等据理力争，警佐无言以对，愤然退去向上司交差。不想张昌庆恼羞成怒，与团长夏兆麟一起率领卫队与兵士荷枪实弹蜂拥而来，张昌庆大骂学生“混蛋、王八”不止，兵士则横冲直撞任意打人。据《申报》1919年7月21日报道：县教育局会长陆祖谷挨了兵士的好几记枪柄，其他应邀前来观剧的四县教育会人员虽仓惶逃避亦不能免，有一位叫毛培之的老人被兵士用枪柄击倒在地，最为悲愤的是省立第二中学学生朱培生被打得左眼突出、胸腰各部皆受重伤。观众及妇女见此残暴行为，吓得纷纷跳窗逃生，售票收入和募捐所得的银元也被劫